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

山东重要历史人物

主编 王志民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

山东重要历史人物

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卷主编 党明德

第五卷



《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编审委员会

成 员 孙淑义 乔延春 齐乃贵 王志民
赵玉兰 张传林 毕泗生 宿 华
王祝玉 袁庆宏 王凤胜 王泉恩
栾文通 高峰岗

主 编 王志民

副 主 编 王祝玉 王凤胜 高峰岗

主任编辑 弓 强

编辑人员 刁仕军 张 眥 马素珍 高峰岗
车明辉 弓 强 刘建一 郑兆相

目 录

- 毛承霖 /001
张英麟 /003
桑树勋 /005
孟洛川 /008
孔祥霖 /015
刘恩柱 /020
汤浦生 /023
高莲溪 /025
杜秉寅 /027
马云亭 /032
萧应椿 /036
汪懋琨 /038
李佳白 /040
周仁寿 /046
杜佐宸 /051
何宗莲 /054
张怀芝 /063

- 王 荀 /068
王燕卿 /071
卢永祥 /073
熊炳琦 /079
张采丞 /085
王踽臣 /088
丁麟年 /092
江钟秀 /094
庄陔兰 /098
周自齐 /100
孔令贻 /105
刘冠三 /110
许椿亭 /115
何丰林 /117
徐镜心 /119
毕宁清 /126
吴佩孚 /129
丁惟汾 /134
孔祥桐 /142
王寿彭 /144
宋传典 /149
张肇铨 /156

- 曲同丰 /159
张公制 /165
靳云鹏 /169
王心葵 /176
丁佛言 /178
张树元 /183
郑金声 /185
赵锄非 /191
何锋钰 /193
陈 干 /196
朱言吾 /201
蒋衍升 /207
张宗昌 /211
陈 柱 /221
杨明斋 /223
杨熙光 /226
潘 复 /230
夏溥斋 /235
夏侯先 /239
蔡曾源 /240
吴大洲 /242
赵 魏 /246

- 孙 屹 /250
路友于 /256
邱丕振 /260
孙传芳 /263
史文彬 /270
孔祥柯 /275
王翔千 /277
袁永平 /280
胡信之 /284
宋伯行 /288
赵金漳 /291
薛文英 /293
薄子明 /296
伦克忠 /301
郭恒祥 /305
张昆弟 /309
王思玷 /312
李慰农 /316
鲁伯峻 /320
王尽美 /323
张玉山 /328
孙美瑶 /331

- 王复元 /333
刘兆章 /336
王全斌 /338
张鸣九 /341
于培绪 /344
邓恩铭 /348
张 眇 /353
李清漪 /355
李大玉 /357
庄龙甲 /359
赵文秀 /362
尹景伊 /366
王寅生 /369
张德善 /372
李春荣 /374
刘一梦 /377
胡殿武 /379
傅书堂 /382

毛承霖

毛承霖（？—1925），字稚云，山东历城人，清两广总督毛鸿宾的次子。1888年考中举人，在籍候选道。

在光绪末年及宣统年间，毛承霖任通志局提调及县志监修，参与编纂《山东通志》和《续修历城县志》。1911年通志脱稿，还没有来得及印刷，辛亥革命就爆发了，于是便将《山东通志》束之高阁。1915年，毛承霖与当地士绅张英麟、王锡蕃商定重行开局，于是邀聚有关人员就《山东通志》原稿详加勘订，补阙正伪，日臻完善。毛承霖亲任总校，并筹措印制款项。自1918年始，《山东通志》陆续排印出版。

在修《山东通志》的人士中，有许多历城人认为《历城县志》已经多年失修，害怕在修省志中搜集到的一些历城的资料被淹没，便萌发了修县志的念头。于是于1907年开局修《山东通志》，到了1908年7月，在籍的候补道、山东通志局提调汪懋琨将其通志局提调任上的每月所得车马费银50两，悉数捐献，作为续修《历城县志》的经费。济南府知府张学华、历城县知县丁兆德也各捐献相助。于是便在通志局内附设历城县志局，由前户部左侍郎、山东通志局总校吴树梅，提调汪懋琨，三品候补道、山东通志局提调毛承霖担任县志监修，由编修《山东通志》的张子杰、王维言、余士干、周襄等人担任分纂。正在调集案卷，尽力搜求之际，辛亥革命爆发，仅将搜集到的资料辑录成县志稿本十余册，即停手作罢。

1919年《山东通志》出版告成，参与其事的毛承霖等人筹备继续编修《历城县志》，当时的历城知县得知后，登门拜访毛承霖，当即商定编修《历城县志》。由历城县耆绅张英麟任监定，总负责；毛

承霖任总修，长驻局中，承担一切募捐、核稿事项，他成了《历城县志》的实际负责人。其他还有分纂6人，襄纂2人，分校7人，采访14人，绘图1人，庶务兼文牍1人，收掌1人。前后参加者计33人。这次编志，于1919年农历七月开始，以清末续修县志原稿为基础，搜罗资料重加厘定。道光年间重修的《济南府志》流散多年后，于民国六七年间又发现了10册，使这次续修县志又多了参考资料。经五年时间，于1924年秋完稿。9月开工排印，但因时局混乱，直到1926年8月才完全装订成书，是为《续修历城县志》。如果以1908年开局续修算起，这次历城县志的续修工作共经历了18年。《历城县志》自明朝始修以来，先后九次编修，毛承霖即参与两次。毛承霖作为县志的一直参与者和总编修，在此凝结了许多心血。

该县志计有54卷，上承1771年印成的《历城县志》，下终于1911年，为记载140年清代历城县自然与社会状况的地方资料书。该书除取消“圣制”、“宸翰”外，其他门类、体例一如乾隆《历城县志》。该书共分为总纪、地域考、山水考、建制考、古迹考、艺文考、金石考、职官考、选举考、世袭考、地封考、宦迹考、列传、杂缀等14门。门下设目，计30目。该志遵循续志通例，凡见于乾隆《历城县志》者，概不重录。物产非本县所特有者，也不收入。志中地域图表采用现代测绘绘图技术制成，较为准确。每一册后附有勘误表。由于与清代相去不远，志书中保存了不少宝贵的清代资料，特别是清咸丰、同治以来的社会变革情况，虽记载简陋，但还有很重要的价值。

该书虽成书于民国，但由于编纂者特别是毛承霖本人属于旧官僚，所以，体例与封建社会的旧志没有什么区别，也有重诗文轻记事、详古略今、不重经济的特点。对社会习俗、兵防军制、时政变迁等方面的反映也比较薄弱。

毛承霖思想保守，入民国后，他仍然蓄留发辫，以示对清朝的忠诚，人们视其为前朝遗老。

(党红星)

张英麟

张英麟（1838—1925），字振卿，号菊坪，山东历城西乡红庙村人。1865年考中进士，即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之职。1874年与检讨王庆祺在弘德殿任行走，陪侍同治皇帝讲读。应该说这是令众多翰林垂涎的差使，但张英麟通达事故，不久告病回家。原因是：同治虽然当上了皇帝，但一切大权均在其母慈禧太后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治皇帝渐渐懂得了事理，也渐渐对他母亲“垂帘听政”、一手遮天的做法开始不满了，为此母子之间产生了矛盾。但矛盾解决的结果总是以同治皇帝遭到母亲一顿训斥而告终。于是同治皇帝便不愿意再理朝政，便和王庆祺在一起厮混，君臣二人甚至便服外出，出入于歌馆青楼。张英麟身在中间，既不愿意阿附同治皇帝和王庆祺，又因事关皇帝隐私，难以启齿进谏，他感到同治皇帝如此下去，恐怕要出现难以预料的大问题，他自己说不定会受到牵连，于是他借故省亲回到了家乡。他回到家乡的那年，才亲政不到两年的同治皇帝就在养心殿死去了。张英麟闻讯，立即回到朝廷“哭临”，而王庆祺则被加上罪名，罢官回到原籍，并且“永不叙用”。这时朝野内外，对同治皇帝病与死的原因传说纷纭，但对张英麟却称赞他守正不阿，能洁身自好。

1875年光绪帝即位后，张英麟主持福建、云南两省的乡试，不久升迁任祭酒，充经筵讲官。1891年，以詹事的身份任奉天府丞兼学政。后升任内阁学士、顺天学政、吏部侍郎。1900年主持完通州乡试回京，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以西狩的名义仓皇逃到西安，百官也纷纷逃离，张英麟独

自坚守学政关防以等待向皇帝汇报考试情况。他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又受到朝廷的好评。次年，奉诏赴西安，上书厉行节约。慈禧太后回京后，议变法，张英麟主张祖宗法制只可整饬，不可匆忙改变。

1903年，张英麟充任会试副总裁，主持河南考试，改试策论、经义，严格批阅，录取博学多才之人。正逢改官制，以侍郎迁任副都统。都统本来是八旗满族人才能授予的官职，将此官职授予张英麟是破例，但也开了汉人授旗官的先例。

1908年张英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这时清王朝已近崩溃，贪财无能的庆亲王奕劻当权，使政局更为黑暗。御史江春麟直言上疏，要求朝廷弹劾奕劻，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江春麟则得到了严旨申斥，还要降职使用，并且将对他的处分记录在案。张英麟身为左都御史，又是江春麟的上司，他联合副都御史及全体御史，上奏皇帝，要求将江春麟留任，以表示提倡直言之风。当时议行“宪政”，准许官员百姓上书，张英麟尽力详审，代为上达。宣统帝即位后，摄政王载沣监国，重视讲读的典制，于是张英麟撰写了《资治通鉴》讲章进呈。1912年1月清帝退位诏书下后，张英霖辞官回乡。

1915年后，张英霖与毛承霖等人赓续中断多年的《山东通志》、《续修历城县志》的编纂，任通志总校和县志监修，使两志得以告竣。

张英麟虽是历城人，但在济南府前街有私宅，1925年冬因病去世，葬在济南西郊段店以南红庙村侧张氏祖茔，原墓封土较高，附近村的人称“翰林墓”。因历经战乱，再加上“文革”破四旧，现已经荡然无存。张英麟善书法，至今开元寺佛慧山上有“大佛头”雕像，龛上刻着“大雄宝殿”四个字，就是张英麟的手迹。

(党红星)

桑树勋

桑树勋（1854—1921），山东菏泽东康庄村人。父亲桑九河，长期在云南为官，为官清正，晚年双目失明，告老还家。由于政声很好，所以在菏泽为官的云南籍官员，上任前都到康庄拜见桑九河，并说：“桑老先生德高望重，是我们云南的父母官，我们不能忘本，不能不先来拜见！”桑树勋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下，自幼刻苦攻读五经四书，文才超众，不久就取得廪生资格。

19世纪末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传播到中国，受新思想的影响，桑树勋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他尤其推崇严复的社会进化理论，他说：“今天要胜过昨天，明天要胜过今天，世道就是这样的变化，不信，你就往后看。”地方上的人士，对他的话不理解，还常常讥讽他。后来看到他的话果然应验，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对桑树勋称赞道：“还是三爷（桑树勋行三）看得准，有眼光，事实上，世道的变化比他想的还要大，可是那个时候，他的话就有不少人反对，还背后骂他呢！”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了改革科举并在全国普遍设立中小学堂的意见，44岁的桑树勋积极响应。他把自己在菏泽城里的九间楼（即现在的东方红大街红旗影院处）和外乡的500亩土地卖掉，折合白银13000两，全部捐献出来办学。由桑树勋捐献创办的这所学校坐落在菏泽城内马神庙街，命名为菏泽私立桑氏小学。桑氏小学是一所初级和高级皆有的完全小学，既招收男生，也招收女生，桑树勋亲自担任校长。废科举、兴学堂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在当时阻力很大，不少有钱人家宁愿让自己的子弟在村里上私塾，读四书，也不让他们到城里去上“洋学堂”，而贫穷人家的子弟能进

学堂的人数也很少。

桑树勋办学，特别主张女子解放要从教育开始，他主张既要办男子学堂，也要办女子学堂，应该让女子进学堂读书。有一次谈到剪辫子的事，他说：“不光男子要剪辫子，女子也要剪发。”他反对妇女缠足，说：“妇女要放脚，要和男子一样顶天立地。”办新学本来就遭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再主张让女子受教育，这在当时封建礼教和旧的习惯势力比较严重的菏泽城，就遭到了某些头面人物和权势之家的反对，甚至还故意造谣中伤，散布流言飞语。桑树勋意志坚定，态度明朗，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了确保办好学校，他把自己在乡下康庄的住宅卖掉，在离桑氏小学50多米的地方买了一处房子，把全家搬到这里居住，桑树勋变卖家产，兴办学堂的感人事迹，终于被大家认可，并得到大家的赞赏，不仅在菏泽城，而且在鲁西南，甚至在山东也有较大反响，被老百姓广为传颂。受桑树勋办学的影响，一个小小的菏泽城，竟办了两处中学和一处小学。

桑树勋为人正派，对自己要求严格，常说：“老师要当学生的表率，当校长的既要当学生的表率，又要当老师的表率。”在清末民初年间的旧中国，社会上层人物抽鸦片者甚多，而桑树勋却没有这个恶习。他不抽烟，不饮酒，清白一身，这作为从封建官宦家庭走出来的社会上层人物是不多见的。他胸怀开阔，性格爽朗，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同情社会地位低下和家境贫苦的人，尽力给予些周济和帮助，受到乡亲邻里的尊敬和爱戴。因此，大家推选桑树勋担任了菏泽县议事会的会长。

1921年夏，桑树勋因病逝世，菏泽各界，特别是教育界深为悲痛。许多受过他周济的穷苦人都失声痛哭，服丧戴孝。菏泽各界人士和学校师生以及亲朋邻里，纷纷前去吊唁，沉痛悼念这位为菏泽教育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开明人士。桑树勋没有亲生儿女，但是，他的丧礼却十分隆重。出殡那一天，部分官员和绅商学界人士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有的挽联写着“德贯桑梓”、“开明人

士”、“功垂千古”等怀念之辞。菏泽的县长和各界代表前来吊丧和送殡，军警护丧，乐队奏乐致哀。桑树勋的大门口竖着两杆大旗，旗面绣着斗大的“桑”字。出殡时，前面 21 人抬着桑树勋的灵柩，后面跟着长长的送葬队伍，从菏泽城东门出发，步行城东五里至桑氏祖茔安葬。隆重的葬礼反映出桑树勋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巨大和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影响。

桑树勋去世以后，他年仅 26 岁的妻子段氏便改姓桑，取名桑绍勋，继任其丈夫办教育的事业。桑绍勋于 1898 年出生在菏泽市马岭岗镇段庄村的一个贫困人家，17 岁嫁给桑树勋。受桑树勋的培养和影响，能粗通文字，明白一些社会进步的道理，再加上她自己聪明勤快，又长于珠算记账，跟着丈夫学到了一些办事的能力。在桑树勋逝世之后，她料理完丧事，很快接任了桑氏小学的校长。并得到了当时菏泽县政府和教育界的支特。她对学校的行政事务认真负责，特别关心师生的生活。她常说：“校长是老师的服务员。”“办学校，首先要有好的教师，离开好的老师，学校是办不好的。”桑绍勋虽然名为校长，薪俸却不高一般教师。她个人生活非常俭朴，常常把省下来的钱接济困难的教师和学生。1921—1948 年，她一直担任桑氏小学的校长和校董。她为人善良，品德高尚，勤劳朴素，热心教育事业，有志气，有骨气，受到人民群众和学校师生员工的爱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菏泽，有人要桑绍勋领取菏泽汉奸政府的津贴，她断然拒绝，说：“我不当汉奸。”所以桑氏小学一度停办。抗日战争胜利后，桑氏小学恢复，桑绍勋将校长职务让给别人，自己改任校董，仍坚持上班，参与学校领导工作，直到 1948 年学校停办。

桑氏小学从创办到发展，经历了 30 多个春秋。学校规模曾一度发展到 13 个班 600 多名学生，办学很有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桑绍勋在康庄生产队劳动，许多人尊称她“老三奶奶”。1964 年夏天，桑绍勋老人离开了人世。

(王 众)

孟洛川

孟洛川（1851—1939），名继笙，字洛川，以字行。山东章丘旧军镇人，祖辈为地主兼商人。其父孟传珊，捐职试用中书科中书候补主事，早逝。其母高氏，系章丘城西关资本家高赤诚之妹，知书达理，深通闺训，孟洛川得母教良多。

孟家原来也是典型的一个耕读之家，到了明中叶开始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开始贩卖旧军镇附近的辛家寨村所产的土布，后发现行商不如坐贾，于是在省城济南创建了庆祥布店和隆祥布店。不久，又在北京设立了瑞生祥绸布店，在周村建立了恒祥染店。孟洛川的曾祖父孟兴智和孟兴泰是旧军孟家祥字号的开山祖，到他的祖父时，孟家已经发展成了八大堂号，孟洛川是矜恕堂堂主孟传珊的儿子。孟传珊热心商业经营，先在周村发展，后抽调资金在济南开设了第一家分号，叫“瑞蚨祥”，专门经营大批量白布业务。而将在周村的“万蚨祥”更名为“泉祥”，将业务方向改为以经营茶叶为主。之所以用“瑞蚨”做店名，是依据了一个传说。古代有一种神虫叫青蚨，比蝉稍大，形状似蝶，产卵必须依附着花草的叶子，即便是偷偷地拿走了它的卵，那母青蚨也一定知道藏卵的地方。于是，传说用母青蚨的血涂在81文铜钱上，用子青蚨的血涂在另外81文铜钱上，每次去买东西，有时先用母钱，有时先用子钱，用掉的钱会再飞回来，这样循环往复，钱永远都用不完。后来人们就把青蚨代称古代的铜钱，瑞蚨的意思就是既给

人祥瑞，又会多聚财。瑞蚨祥布店最先设在济南院西大街，就是现在泉城路南，当时它经营的项目较广，涉及绸缎、绣货和布匹等，而以销售布匹为大宗，加之它是一个新兴的字号，又地处闹市，不仅门面宏丽，内部陈设新颖，而且备货充足、适应时令，所以一开张就赶上甚至超过了孟家原来在济南的庆祥和隆祥两家绸布业老号。孟传珊经营有道，被人们盛赞，又因为他排行老四，所以人称“孟四猴子”。

孟洛川是孟传珊第四个儿子，父亲虽要求他仕进，但孟洛川偏偏继承了父亲的天性，自幼虽聪慧过人，却唯独对读书不感兴趣，而对繁华的商场感兴趣，尤其对于谋划筹算更是无师自通。他十几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将他交给了三伯父孟传廷，伯父带着他经常外出参加贸易往来活动，增长了他的商业阅历和经验。18岁那年即执掌了布店，仅仅几年工夫，就对商业经营和管理之道烂熟于胸，并处理了几件令长辈和业界拍案叫绝的事情。凭着他的雄才大略和过人胆识，使矜恕堂很快在族业中异军突起，不久又兼管了孟家三恕堂、其恕堂、容恕堂、矜恕堂四房合股在济南开设的庆祥和瑞生祥钱庄，成为旧军孟氏工商业的主要代表。

1896年，孟洛川将周村泉祥总号迁往济南估衣市街，与瑞蚨祥绸布庄为联号，周村成为分号。1910年，孟洛川仍用泉祥专营茶叶，在福建、安徽、浙江等地设了收茶点和制茶工厂，形成了收购、加工、批发、销售一条龙。又在北京、天津、青岛、烟台等地陆续设立了分号，经营茶叶零售业务，但以周村规模最大，20世纪30年代的年纯利润达6万元，为全国孟氏各茶业商号之冠。

二

孟洛川经营的瑞蚨祥之所以在全国驰名，就在于他注重先进的经营理念。其经营特点归纳为九点：